

【史学史研究】

# “通史家风”与章学诚的通史思想

王记录

**【摘要】**要想准确理解章学诚“通史家风”的内涵，“通”和“家”这两个概念缺一不可。“通史家风”之“通”，既有编纂学意义上的“纵通”和“会通”，也有思想层面上的“通识”和“变通”；“通史家风”之“家”，以“家学”为中心考察史学宗旨之承变，从“家学”到“《春秋》家学”再到成一家之言的“通史家风”，建立了“通史家风”与“《春秋》家学”之间的精神联系。章学诚还比较了“通史”“集史”“断代史”的差异，认为三者“家法”不同，宗旨有别，将似通而非通的史著排除在通史之外。章学诚认为，“专家之学”和“别识心裁”是通史撰作的最高境界，“别识心裁”既体现在体例上，又体现在史义上。以“通”论“家”，“家”因“通”而明源流；以“家”衡“通”，“通”因“家”而分类例，这是章学诚通史思想的最大特点。

**【关键词】**清代；章学诚；通史家风；家学；通史

**【作者简介】**王记录，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，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史（河南 新乡 453007）。

**【原文出处】**《史学史研究》（京），2022.4.48～60

**【基金项目】**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“《资治通鉴》研究”（项目编号：2022-JCZD-14）阶段性成果。

“通史家风”是章学诚在《文史通义·申郑》中提出的重要学术命题，并据此阐述了自己的通史思想。关于“通史家风”，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，多以章学诚的命题为引子，提出今人对“通史家风”的理解<sup>①</sup>。至于章学诚“通史家风”的意蕴究竟是什么，其通史思想又是什么，并没有回到章学诚的语境中进行认真梳理。

## 一、“通”与“家”：“通史家风”的意蕴

章学诚的“通史家风”，最关键的是两个概念：“通”和“家”。以往的研究，很重视“通史家风”之“通”<sup>②</sup>，而忽略了“通史家风”之“家”。事实上，忽略了“家”，就无法探知“通史家风”的全貌。只有把“通”与“家”联系起来，才能全面理解“通史家风”的意蕴。

### （一）“通史家风”之“通”

章学诚重“通”，他的两部著作《文史通义》和《校讎通义》均以“通”命名。他还在《文史通义》中辟《释

通》《横通》等篇章，专门讨论“通”和“通史”。“通”是章学诚最感兴趣的学术话题之一。他说：“通之为名，盖取譬于道路，四冲八达，无不可至，谓之通也。亦取其心之所识，有高下、偏全、大小、广狭之不同，而皆可以达于大道，故曰通也。”<sup>③</sup>章学诚所谓“通”，有两层含义：一是具象意义上的“通”，就像道路一样四通八达而无所不至；二是抽象意义上的“通”，犹如人的见识，虽有高下偏全之差异，只要能达于“道”，亦谓之通。可见，章学诚所揭示的“通”，有显性和隐性两层意义，具体到“通史家风”之“通”的意蕴，他也是在编纂学（显性）和学识（隐性）两个层面上展开讨论的。

在章学诚眼里，编纂学意义上的“通史”之“通”具有“纵通”“会通”的特点，强调通史编纂的“时贯古今”与“会通四部”。

刘家河先生曾指出：“通”字本来是指空间意义上的由此及彼，而空间上的往来不穷又是在时间里

进行的,因而也就变成了时间上的连续不断。‘通’字用之于在时间中运行的历史,于是‘通史’之‘通’,主要即指时间上的连续而言。”<sup>④</sup>章学诚以道路之空间上的四通八达而引出对“通史”时贯古今的认识,他说:“通史人文,上下千年,然则义例所通,则不嫌合撰。”<sup>⑤</sup>又说:“通史远自古初,及乎作者之世。”<sup>⑥</sup>他特别指出司马迁作《史记》“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”<sup>⑦</sup>,杜佑作《通典》“可谓穷天地之际而通古今之变者矣”<sup>⑧</sup>。所谓“上下千年”“远自古初”“通古今之变”,都是指时间上的“纵通”,即时贯古今。章学诚继承了司马迁、杜佑、司马光等前代通史家“贯通古今”的思想,将“通史”看作是一个时间上连续的整体。西方“普世史”重在“共时性的空间之纬”,中国“通史”重在“历时性的时间之经”<sup>⑨</sup>,揆诸章学诚的论述,这样的总结无疑是非常准确的。

章学诚的“通史”之“通”还有“会通”一切文献之义。章学诚指出,《史记》除了时间上贯通古今外,还广涉四部。他盛赞郑樵“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”而作《通志》,并遥接郑樵“总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而会于一手,然后能同天下之文”<sup>⑩</sup>的会通思想,在讨论通史撰述时,极力赞赏“会通”的做法:杜佑作《通典》“统前史之书志”,裴潏作《太和通选》“汇公私之述作”,司马光作《通鉴》“合纪传之互文”,郑樵作《通志》“总古今之学术”<sup>⑪</sup>。所谓“统”“汇”“合”“总”,均有会通四部之含义。在章学诚心目中,四部之书均“相出入”且“相资为用”<sup>⑫</sup>。章氏认为,作“通史”要能“会通”一切文献,网罗百家,才能展现“通史”之“通”的魅力。

学识意义上的“通史”之“通”具有“圆神”“变通”的特点,更多地强调通史撰述的“通识”。

章学诚曾用“圆神”“方智”两个概念来解读中国史学,指出“圆而神”具有“神以知来”“知来欲其抉择去取,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”的特点,“方以智”具有“智以藏往”“藏往欲其赅备无遗,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”的特点<sup>⑬</sup>。“圆神”与“方智”相较,“方智”比较好理解,而“圆神”总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整体感觉和“意味”<sup>⑭</sup>。实际上,“圆神”的整体感觉和“意味”

里蕴含一种“通识”。这种“通识”是个性化和体悟性的,用章学诚的话说就是“其中隐微可独喻,而难为他人言者”<sup>⑮</sup>，“神而明之,存于其人,可意会而不可言传,人皆戛戛,我独有余”<sup>⑯</sup>。抛却其中的神秘性不谈,“圆神”实际上就是要表达“通史”之“通”的“通识”境界,一种“通识”眼光下的通史撰述的“悟性”。章学诚重视“识”,他认为词章、考订、义理分别对应才、学、识,词章主于才,考订主于学,义理主于识,而才、学、识又对应作性、记性和悟性,“作性扩而成才”“记性积而成学”“悟性达而为识”<sup>⑰</sup>。“识”需要“悟性”,而“悟性”具有个体性,可意会不可言传。通史撰述要达于“圆神”,就需要有“通识”及“通识”之下的“悟性”,即思维的整体性和系统性。没有“通识”,是难以达到“圆神”的。章学诚说:“神以知来,学者之才识是也;知以藏往,学者之记诵是也。才识类火日之外景,记诵类金水之内景……金水能受火日之光,而火日不能受金水之光也。”<sup>⑱</sup>笔者以为,此“才识”蕴含“通识”之意。“神以知来之才识”彰显作者的“通识”,像太阳(火日)之光芒;“智以藏往之记诵”像金星、水星(金水)之内敛,太阳可以照亮金星、水星,反之则不可能。“通识”之重要,于此可见一斑。章学诚批评那些名通而实不通的史著,貌似汇合所有资料,上下左右贯通,实际上只是“摘比分标,不相联合”,缺乏“通识”,没有形成浑然一体的知识体系,“识乏通材,遂使书同胥史矣”<sup>⑲</sup>。“识乏通材”对于通史撰述的伤害是致命的。

“变通”也是章学诚“通史家风”的重要思想遗产。章学诚数言“唐后史学绝”<sup>⑳</sup>，“史学至唐而尽失”<sup>㉑</sup>。因为在他看来,唐以后作史,“猥以集众官修之故事”,“史文等于科举之程式,胥吏之文移,而不可稍有变通矣”<sup>㉒</sup>。章学诚认为作史贵在“变通”,他以《易》之变易提倡“史学通识”<sup>㉓</sup>,屡次批评唐以后史学僵化,“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,不敢稍变”。面对唐宋以来史学僵化的局面,章学诚大声疾呼要“思所以变通之道”<sup>㉔</sup>!他指出《史记》作为通史,具有“圆神”的特点,但后世作通史者不知变通,将司马迁的“通识”彻底湮没,“迁书所创纪传之法,本自圆神,后世袭用

纪传成法,不知变通,而史才、史识、史学,转为史例拘牵,愈袭愈舛,以致圆不可神,方不可智”<sup>⑤</sup>。他赞扬郑樵作《通志》,就是因为郑樵能够变通通史义例,自成一家,所谓“变通亘古以来,合为一家记载”<sup>⑥</sup>。章学诚主张作通史必须“拟神”,不能拘守成法,要“贵得其概而有以变通之”。他指出,只有变通,才可能化腐朽为神奇,扭转史书编纂僵化的局面。章氏指出,袁枢《通鉴纪事本末》系改司马光《通鉴》而来,本无神奇之处,就是因为“穷变通久自有其会”,才使之成为史学史上的杰作,“《纪事本末》本无深意,而因事命题,不为成法,则引而伸之,扩而充之,遂觉体圆用神”<sup>⑦</sup>。“穷变通久”成为章学诚“为从此百千年后史学开蚕丛”的思想支柱。

要之,显性(编纂学)意义上的“通史”之“通”与隐性(学识)意义上的“通史”之“通”既有区别又有联系。显性意义上的“时贯古今”和“会通四部”只有借助隐性意义上的“圆神”和“变通”才能成就章学诚所理解的“通史”。没有“通识”的通史编纂,只能是数千年历史的资料汇编,难以构成有内在联系的知识体系和思想体系。

## (二)“通史家风”之“家”

美国学者倪德卫认为“家”是章学诚的核心概念之一,并认为“‘家学’概念与章学诚的史学概念最为密切”<sup>⑧</sup>。章学诚数言“家学”“家法”“一家之言”等,并提出“通史家风”。那么,“通史家风”之“家”与“家学”“家法”“一家之言”等有什么样的内在关系?此为全面理解章学诚“通史家风”意旨的关键。

章学诚所言“家学”,来源于他对先秦学术发展的认知。章学诚指出,三代“学在官府”,官吏掌握图书并传授其学。因“官守学业合一”,“以吏为师”成为学术传授的常态,“六艺”皆有官师传习<sup>⑨</sup>。及至春秋战国时期,随着周天子大权旁落,官守学术的局面被打破,“官师治教分离”,私学兴起,学术传承出现了从“王官之学”向“百家之言”的转变。三代时期“即官守而存师法”的局面被春秋战国时期“人自为书,家自为说”的局面所代替,“诸子纷纷著书立说,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”<sup>⑩</sup>,于是“自树一家之学也”<sup>⑪</sup>的

“家学”兴起。章学诚的“家学”从“官师合一”的“官学”演变而来,所指乃三代“官学”散裂、私家学术兴起后的新的学术传统。

从“家学”出发,章学诚将史学“家法”追溯到孔子作《春秋》,并数言“《春秋》家学”。所谓“史学本于《春秋》”<sup>⑫</sup>，“二十三史,皆《春秋》家学也”<sup>⑬</sup>，“陆贾、史迁诸书,刘、班部于《春秋》家学,得其本矣”<sup>⑭</sup>,不一而足。章学诚之所以将史家之学追溯到《春秋》,并提出“《春秋》家学”,是因为在他看来,《春秋》“属官师、政教分途之后的第一部私家史学著述”,“为专家史学之祖”<sup>⑮</sup>。章学诚将《春秋》看作是史学的源头,并以“《春秋》家学”概括之,目的是辨章史学精神,考镜史学源流。

章学诚说:“古人最重家学,叙列一家之书,凡有涉此一家之学者,无不穷源至委,竟其流别,所谓著作之标准,群言之折衷也。”<sup>⑯</sup>由此出发,他考察了中国史学史上能绍法“《春秋》家学”而“自成一家之言”的史家,认为司马迁、班固等人能当其任。章氏指出,古代史家纪事,“其源本于《春秋》‘比事属辞’”,而继承《春秋》“属辞比事”的代表就是司马迁和班固,其“家学渊源,甚于汉廷经师之授受。马曰‘好学深思,心知其意’;班曰‘纬六经,缀道纲,函雅故,通古今’者,《春秋》家学,递相祖述”<sup>⑰</sup>。“迁、固之书本绍《春秋》之学”<sup>⑱</sup>。在章学诚看来,以司马迁《史记》为代表的通史和以班固《汉书》为代表的断代史,都是继承《春秋》属辞比事之学的杰作。但是,他更注意区分二者在史学宗旨上的差异。在章学诚看来,“家学”所追究的是学术内在精神的传承,而非形式上的类别或归属。比如,人们通常将《史记》《汉书》都看成是纪传体之宗。章学诚却认为,从“辨章学术,考镜源流”的角度讲,《史记》的“家法”是通史,开创了通史的学术传统,《汉书》的“家法”是断代为书,开创了断代史的传统。“谈、迁、彪、固,并称世史,而彪、固实与谈、迁不同。谈、迁同为通史,而班氏则彪亦通史家学,故《后传》依附百三十篇……至班固乃始确然以断代为书……遂为后代不祧之祖,而通史之业微矣。辨家学者,不容不知其义也。”<sup>⑲</sup>在章学诚看

来,中国史学史上“通史”和“断代”两大传统,均可追溯到“《春秋》家学”,但又各有“家法”,只有辨其“家学”,才能明其学术统绪和学术精神之差异。

章学诚认为司马迁的“一家之言”与孔子的“《春秋》家学”关系极为密切。所谓“夫史迁绝学,《春秋》之后一人而已。其范围千古,牢笼百家者,惟创例发凡,卓见绝识,有以追古作者之原,自具《春秋》家学耳”<sup>⑩</sup>。“通史仿于史迁,自是一家著作,溯源《春秋》,其间多有法外之意,可意会而不可言传”<sup>⑪</sup>。凡此等等,意在揭示司马迁以卓见绝识,创例发凡而作《史记》是绍述“《春秋》家学”。也就是说,《史记》“成一家之言”的“通史家法”与孔子的“《春秋》家学”一脉相承,是“继《春秋》而成一家之言者”<sup>⑫</sup>。换言之,司马迁继承“《春秋》家学”,开创通史编纂的史学传统,形成了“通史家风”。南宋郑樵“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”,绍述司马迁的通史思想,撰述《通志》,所谓“遂欲匡正史迁,益以博雅;贬损班固,讥其因袭。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,运以别识心裁,盖承通史家风,而自为经纬,成一家言者也”。章学诚极力称颂郑樵,就在于郑氏继承了“通史家风”,能够“创条发例,巨制宏编,即以义类明其家学”<sup>⑬</sup>。很显然,章学诚认为,从孔子的“《春秋》家学”,到司马迁的“通史家风”,再到郑樵对“通史家风”的继承和发扬,一以贯之。“《春秋》家学,递相祖述”,史学才有了活泼泼的生命力。可见,不懂“家学”“家法”“家风”之间的关系,就不好理解“通史家风”的旨趣。

章学诚认为,《春秋》事、文、义三者之间,“义意为圣人所独裁”<sup>⑭</sup>,蕴含了孔子的思想,这是“《春秋》家学”的首要内容。对于《春秋》之“义”与通史撰述的关系,章学诚有一段著名的论述:“史之大原本乎《春秋》,《春秋》之义昭乎笔削。笔削之义,不仅事具始末、文成规矩而已也。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,固将纲纪天人,推明大道,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,必有详人之所略,异人之所同,重人之所轻,而忽人之所谨,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,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,而后微茫秒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,及其书之成也,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,契前修而俟后

圣,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”<sup>⑮</sup>。这段话内涵丰富:经世层面上,“纲纪天人,推明大道”“通古今之变”;撰述层面上,体例灵活,“独断于一心”“成一家之言”。章学诚所极力倡导的“《春秋》家学”,其“义”就在于此!而这也正是“通史家法”所在,是司马迁、郑樵所遵循的作史原则。

总之,章学诚抓住“家”这个核心概念,由“家学”而“《春秋》家学”,由“《春秋》家学”而司马迁的“一家之言”,由“一家之言”而“通史家风”,将“通史家风”与“《春秋》家学”贯通,使古今史学建立了“精神之间的直接联系”<sup>⑯</sup>。“通史家风”之“家”,就是通史撰述的学术传统和精神承续。

## 二、“通史”“断代”与“集史”:通史的特性

在《文史通义》中,章学诚通过比较研究,细致区分了“通史”与“断代史”“集史”的源流、类别和宗旨,进一步彰显通史的特性。

### (一)“通史”“断代”“集史”的差异

在讨论通史和断代问题时,章学诚敏锐地发现,在通史与断代之间还有一种既非通史、亦非断代的“断取数代之书”——“集史”。譬如李延寿的《南北史》,刘知幾在《史通·六家》中将其归为《史记》“通史家”,所谓“李延寿抄撮近代诸史,南起自宋,终于陈,北始自魏,卒于隋,合一百八十篇,号曰《南北史》……皆《史记》之流也”<sup>⑰</sup>。对此,章学诚提出异议:“刘知幾六家分史,未为笃论。《史记》家,自是通史……至李氏《南北史》乃是集史,并非通史……刘氏牵合为一,非其质矣。”<sup>⑱</sup>他重新区分类例,指出“马迁乃通史也,梁武《通史》、郑樵《通志》之类属之。班固断代专门之书也,华(峤)、谢(沈)、范(晔)、沈(约)诸家属之……《南北史》断取数代之书也,欧、薛《五代》诸史属之”<sup>⑲</sup>。“若李延寿《南北史》,乃是汇辑沈、萧、姚、李等八家之书,整齐纪传,使不杂乱,其例自有断限,当入集史,不可入通史。”<sup>⑳</sup>

对于“通史”和“断代”旨趣的差异,章学诚进行了细致区分。他以《史记》《汉书》为例指出,从形式上看,二者都是纪传体,但从谋篇布局到著史宗旨,“通史家学”与“断代之祖”都存在极大差异,“《史记》

为通史,《汉书》则断代为书,体固不侔”,“宗旨已不侔矣”<sup>⑤</sup>。他用两两对比的方式来凸显通史与断代的不同,“马则近于圆而神,班则近于方以智也”,“迁书通变化,而班氏守绳墨”,“迁书体圆用神,多得《尚书》之遗,班氏体方用智,多得官礼之意也”,“迁史不可为定法,固书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”<sup>⑥</sup>。也就是说,以《史记》为代表的通史的特点是“圆而神”“通变化”“无定法”,而以《汉书》为代表的断代史的特点是“方以智”“守绳墨”“拘成法”。在“整齐故事与专门家学”<sup>⑦</sup>之间,作为通史的《史记》是“专门家学”,作为断代史的《汉书》是“整齐故事”。

基于以上认识,章学诚进一步指出,司马迁创立通史,成一家之言,“其间多有法外之意,可意会不可言传。若在官修史书,不可行矣。故元、成之间,屡诏续补,而迄无足观。自班氏而后,断代之书递相祖述,师般不作,规矩可循,故至今相仍而不废也。”<sup>⑧</sup>由于通史撰述“自是一家之言”“通变化而无定法”,有其独特的“法外之意”,属“专门之业,自具体要”<sup>⑨</sup>,有一种对史学终极意义的领悟,难以遵循,需要创新,所以后世有成就的通史极少;而断代史“有规矩可循”“守绳墨而拘成法”,故而绳绳相继,因仍不断。在章学诚看来,作断代史易,作通史难。他之所以为郑樵辩护,就在于郑樵发扬了司马迁的通史精神,“心知其意”,迎难而上,“发凡起例,绝识旷论,所以斟酌群言,为史学要删”<sup>⑩</sup>。郑樵《通志》所记史事与旧史没有什么不同,但他“有志乎求义”,终于成就不朽之史著,“若郑氏《通志》,卓识名理,独见别裁,古人不能任其先声,后代不能出其规范,虽事实无殊旧录,而辨明正物,诸子之意寓于史裁,终为不朽之业也”<sup>⑪</sup>。

关于“通史”与“集史”旨趣的差异,章学诚也进行了论证。他说:“集史之书,体与通史相仿,而实有淄澠之分。通史远自古初,及乎作者之世,别出心裁,成其家学,前人纵有撰述,不复取以为资,如梁武不因史迁,郑樵不因梁武是也。集史则代有所限,合数代而称为一书,以继前人述作,为一家言,事与断代之史约略相似。而断代又各自为书,体例不一,集

史则就其所有诸体而画一之,使不至于参差足矣,事取因人,义求整齐,与通史之别出心裁,无所资藉,断代之各自为书者,又各不同也。”<sup>⑫</sup>这段话将“通史”“集史”“断代”放在一起比较,从时间断层看,“通史”自远古写到作者之世,“集史”则断取数代,“断代”乃一朝之史。从撰述形式看,“通史”不相因袭,“集史”继承前人述作,将诸体整齐划一,“断代”则“各自为书,体例不一”。从撰述思想看,通史“别识心裁,成其家学”,集史“事取因人,义求整齐”。总之,集史与通史貌合神离、貌同心异,在性质上截然不同;其与断代史则貌离神合、貌异心同,在性质上没有本质差异。

章学诚进一步比较了“通史”和“集史”的异同,他认为通史和集史在宗旨上“判若天渊”。“通史各出义例,变通亘古以来,合为一家纪载”,“集史虽合数朝,并非各溯太古,自为家学者可比”。因为“通史各溯古初,必须判别家学,自为义例,方不嫌于并列,否则,诚不免于复沓之嫌矣。集史原有界画,李延寿行之于前,薛、欧行之于后,各为起讫,无所重复,虽一家凡例,两书可通用也。”<sup>⑬</sup>在章学诚看来,通史各出义例,自为家学,不蹈袭前人;而集史则是断代史的集合,义例可以通用,内容各有起讫,可以因袭前人。集史记载数朝史事,囿于断代史局限,发凡起例不妨相同,宗旨问题尚不突出。而通史突破朝代局限,贯通古今,各通史的叙事内容大致相同,如果义例无别、宗旨不明,就会造成叙事重复,失去存在的价值。

在中国史学史上,上下贯通的著述在在多有,如果不加分别,很容易将这些著述与具有“别识心裁”的通史混为一谈,致使家法混淆,流别不明,不利于“辨章学术,考镜源流”。对此,章学诚立足于著述宗旨,对那些貌似通史的史著,一一辨析其编纂义例,揭示这些史著的本质。梁武帝萧衍撰《通史》,上起三皇,下至南朝齐,章学诚认为“史籍标通,此滥觞也”,但同时指出该书“集众官修,知其必不能用专门著述之意也”<sup>⑭</sup>,与司马迁、郑樵诸人倡导的通史观念“流别不同”。“至于高氏《小史》、姚氏《统史》之属,则

搏节繁文,自就隐括者也。罗氏《路史》、邓氏《函史》之属,则自具别裁,成其家言者也。范氏《五代通录》、熊氏《九朝通略》,标通而限以朝代者也。李氏《南北史》,薛、欧《五代史》,断代而仍行通法者也。其余纪传故事之流,补辑纂录之策,纷然杂起,虽不能一律以绳,要皆仿萧梁《通史》之义,而取便耳目。史部流别,不可不知也”<sup>④</sup>。北魏元晖撰《科录》,摘录上古至南朝宋十四代史籍,以类相从,“则是类比之书,并无著作深意,当与《高氏小史》之类,并入史纂,不可以入通史”<sup>⑤</sup>。在章学诚看来,像高峻《高氏小史》、姚康复《统史》、罗泌《路史》、邓元锡《函史》、范质《五代通录》、熊克《九朝通略》、李延寿《南北史》、薛居正《旧五代史》、欧阳修《新五代史》、元晖《科录》之类的史著,虽包罗数代甚至溯源上古,但或隐括节选,或自为体系,或比次纂录,“并无著作深意”,与司马迁、郑樵等人独具别识心裁、成一家之言的通史“宗旨有别也”。章学诚意在告诉人们,区分“通史”与否,不可仅从形式上判断,更要从宗旨上判断。

通过一系列的辨析,章学诚总结了“通史”的特性:“凡所谓通史者,不问记载短长,学问疏密,要有卓然独见,迥出前人,灼见前代成书,己意难以因袭,故舍置前史,独溯古初,以自成家。与节钞、类比、隐括诸书,相差虽似毫厘,而相去不啻千里。”<sup>⑥</sup>在章学诚看来,通史的核心内涵是不因袭前人,有卓然独见,自成一家。所谓“不问记载长短”,并非否定通史在时间上的自古至今,而是要说明朝代上的打通还不能就称为“通史”,那些包罗几个朝代的史书,因无“别识心裁”,是似通而实不通的“集史”。在章学诚这里,有了时间上的上下贯通,没有卓识独见,无法自成一家,是不能称为“通史”的。

## (二)通史的“六便”“二长”“三弊”

章学诚比较了通史、集史和断代史的差异后,提出通史编纂的“六便”“二长”“三弊”。他说:“通史之修,其便有六:一曰免重复,二曰均类例,三曰便铨配,四曰平是非,五曰去抵牾,六曰详邻事。其长有二:一曰具剪裁,二曰立家法。其弊有三:一曰无短长,二曰仍原题,三曰忘标目。”<sup>⑦</sup>章学诚的史学理论

多有形而上学的特点,除了方志编修外,他较少从微观层面讨论史书编纂问题,但对于通史编纂,他却倾尽心力,立足“通史家风”,从宏观到微观,讨论通史编纂的利弊得失,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独树一帜。

在章学诚看来,通史有“六便”。所谓“免重复”,即通史叙事能够前后一贯,避免重复。尤其是王朝交替之际,同一人物或史事,前代史书要记载,后朝史书也要记载,徒费笔墨,而通史上下贯穿,“事可互见,文无重出,不亦善乎”!所谓“均类例”,即通史较易统一全书体例。断代史中的《天官》《地理》《艺文》等志,名称不同,体例不一,渊源不明,但通史能“通前后而勒成一家,则例由义起,自就隐括”,一目了然。所谓“便铨配”,即通史便于统筹安排人物和史事。断代史在处理人物传记时,或按朝代,或按出生先后,或附传,或类传,不一而足,但通史可以根据作者的“别识心裁”处理人物关系,比如将屈原与贾谊同传等,“正有深意,相附而彰,义有独断”。所谓“平是非”,即通史有利于公允评价历史。历史人物的是非曲直,只有放到历史的长时段才可能有较为公允的评价,“惟事隔数代,而衡鉴至公,庶几笔削平允,而折衷定矣”。所谓“去抵牾”,即通史有助于消除纪事矛盾。断代史记载一朝史事,“各有裁制,详略去取,亦不相妨”,但对横跨两朝之史事,记载往往出现抵牾,但通史“统合为编,庶几免此”。所谓“详邻事”,即通史可以完整记载周边各族的历史发展过程。四裔外国的历史发展,不可能与中原王朝同其始终,断代史所记周边民族历史,往往不能首尾俱全,而通史却能解决这一问题。章学诚所归纳的通史“六便”,展现了通史叙事的优势,是在梳理以往通史、断代史撰述的基础上进行的深刻总结。

章学诚还归纳出通史的“二长”：“具剪裁”和“立家法”。此“二长”显示的是“通史家学”所必须具有的“一家之言”的境界。“具剪裁”意即通史能彰显史家笔削剪裁之功。章学诚认为通史“通合诸史”，可以用“一家绳尺”发凡起例、拾遗补缺、删落浮辞，文省前人、事详往牒。这是断代史、集史所无法做到的。“立家法”即通史以“成一家之言”为准的。章学

诚指出,通史是在前代史书的基础上编纂而成,如果不能“立家法”,那么“陈编具在,何贵重事编摩”?所以通史编纂是“专门之业”,必须具有“卓识名理,独见别裁”,才能成就名山事业。章学诚的通史“二长”观,实际上是他重视“专门家学”“别识心裁”思想在通史编修中的具体体现。

章学诚虽然盛赞通史,但从来没有迷信通史,他指出通史有“三弊”：“无短长”“仍原题”“忘标目”。“无短长”即通史容易流于纂辑之书。通史编纂如果只是依据前史比次资料,换换标题,内容无增损,没有“独断之学”,很易成为纂辑之书,无人问津。“仍原题”即通史编纂容易沿袭旧作。通史撰作如果沿袭旧作“品目”,不加更定,极易出现“去取失当”。“忘标目”即通史叙事内容丰富,涉及方方面面,很容易造成标目混乱。帝王、后妃、宗室等,按朝代标题,一目了然;列传没有标别,因史事而按叙次编排,也能自见朝代;但《独行》《方技》《文苑》《列女》等类传,按照一个体例将众多的人编在一起,无法看出其身处何世<sup>⑥</sup>。章学诚所论通史“三弊”,表面看似只是史书编纂的问题,但其背后却是“剽袭剽窃”“漫无法法”的问题。

总之,章学诚通过“判别家学”,比较了“通史”“断代”与“集史”的差异,指出三者“家法”不同,宗旨有别。“断代史”详尽记载一代历史,体例规整,有成法可依;“集史”包罗数朝,似通非通,似断非断,义例上与通史相似,而本质上与断代相通;“通史”除了时间上的贯通古今之外,更须“各出义例”,具有“别识心裁”,系统条理,删繁就简。通史叙述历史,有自身的优势,是断代史、集史所不能取代的。

### 三、“专家之学”与“别识心裁”:通史的境界

在《文史通义》中,章学诚对唐以后通史编纂的不断“堕落”表示了极度的不满。他说:“载笔汇而有通史,一变而流为史钞,再变而流为策士之括类,三变而流为兔园之摘比,不知者习而安焉,知者鄙而斥焉,而不知出于史部之通,而亡其大原者也。”<sup>⑦</sup>所谓“史钞”,即“并无别裁”的贯通古今的节钞之书;所谓“策士之括类”,即“便于对策敷陈之用”的史书,如

《文献通考》,“分析次比,实为类书之学,书无别识通裁”;所谓“兔园之摘比”,即《纲鉴和纂》之类浅近的书籍。这类貌似通史的著述,因“师法失传”,没有“别识心裁”,与司马迁《史记》、郑樵《通志》等“法外之义例”“独具之心裁”的通史相比,失去了“通史”的原本意旨,结果成为史钞、括类、摘比之书,与通史之“本旨大原”愈离愈远。

唐以后通史编纂之所以出现“堕落”,关键是缺少了“专家之学”和“别识心裁”。在章学诚看来,史家必须具有“专家之学”和“别识心裁”,才能撰写出“能通天下之志”的理想通史。换言之,理想的通史是那些具有“专家之学”和“别识心裁”的通史,“专家之学”和“别识心裁”就是通史编纂的“本旨大原”。

章学诚乐谈“专家”,譬如“既为著作,自命专家,则列传去取,必有别识心裁,成其家言”<sup>⑧</sup>，“学问专家,文章经世,其中疾徐甘苦,可以意喻,不可言传”<sup>⑨</sup>，“吾于史学,贵其著述成家,不取方圆求备,有同类纂”<sup>⑩</sup>，“《春秋》有口耳之受,马班有专家之学”<sup>⑪</sup>，等等。章学诚所言“专家”，与今天分科治学背景下的“专家”含义不同。余英时认为,章学诚的“专家”有两层含义,一是“专家”相当于“成一家之言”,能成一家之言者即为专家;二是“专家”又与“约”之义相通,即能把握住学问之大体者为专家,与“尚博”而不能把握大体者不同。“实斋的‘专家’是对学问先具有一种大体的了解,并且逐渐从大处建立自己的‘一家之言’”<sup>⑫</sup>。章益国在此基础上指出:“章学诚所谓‘专家’,实是‘专门家学’的省略语,是‘成一家之学’的‘专家’。”<sup>⑬</sup>

章学诚贵专家之学,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:其一,“专家之学”有“统系”。章学诚认为“家学”既有自己显性的授受统系,还有一种内向而求的精神上的接续前人。所谓“古人有专家之学而后有专门之书,有专门之书而后有专门之授受”<sup>⑭</sup>,这是显性的“专门家学”的授受。就通史编纂而言,后人编纂通史,汲取前人经验,必须是“师法其意”<sup>⑮</sup>,而非拘守成例,这是对前人作史精神的接续。可见,“专家之学”明显带有个性化学术传衍或学术流派的特征,从而

使公共的知识有了特殊的意义。其二,“专家之学”富有独见。章学诚认为,司马迁、班固有“专门家学”,但自唐以后,专门家学衰而史学绝,刘知幾、曾巩、郑樵生“史学废绝之后”,尚“能推古人大体”<sup>⑤</sup>,其他都不值一提了。所谓“师法不立,学无专门,末俗支离,不知古人大体”<sup>⑥</sup>。所以章氏言:“子长、孟坚氏不作,而专门之史学衰。”<sup>⑦</sup>正因为史家有“专门之学”,所以才会出现同修一史而相互矛盾的现象,“马、班同修一史,必有矛盾之嫌,以此知专门之学,未有不孤行其意,虽同侪争之而不疑,举世非之而不顾”<sup>⑧</sup>。章学诚的“专家之学”,强调的是自成体系的“一家之言”。他认为,“诸史不难其事,而难其有以成一家之言”<sup>⑨</sup>。其三,“专家之学”隐含性情意趣。章学诚给“专家之学”注入了一种个人性的“精神意趣”。他说:“专家之旨,神而明之,存乎其人,不可以言传也。其可以言传者,则规矩法度,必明全史之通裁也。”<sup>⑩</sup>又说:“专门家学,书不尽言,言不尽意,必须口耳转授,非笔墨所能罄,马迁所谓藏名山而传之,必于其人。”<sup>⑪</sup>所谓“神而明之”,“书不尽言,言不尽意”,“不可以言传”等,是“功力”之外的一种“精神意趣”。章氏认为,史家治史,只有将“功力”和“精神意趣”相结合,才能成就一番事业。他说:“学贵专门,识须坚定,皆是卓然自立,不可稍有游移者也。至功力所施,须与精神意趣相为浹洽,所谓乐则能生,不乐则不生也。”<sup>⑫</sup>对此,钱穆曾指出:“实斋论为学从入必本性情,而极其所至则以专家为归。”<sup>⑬</sup>又说:“实斋论学,发乎性情,极乎通识。”<sup>⑭</sup>也就是说,章学诚的“专家之学”从史家个人性情出发,施以功力,打通诸般关节,达于“通识”之境,成就“专家之业”。

章学诚论通史编纂,常将“专家之学”与“别识心裁”置放一起。所谓“纪传最古者,如马、班、陈氏,各有心裁家学,分篇命意,不可以常例拘牵”<sup>⑮</sup>，“通史远自古初,及乎作者之世,别出心裁,成其家学”<sup>⑯</sup>等。他特别看重“别识心裁”,声称“余著《文史通义》,不无别识心裁,不知者或相讥议”<sup>⑰</sup>。也就是说,“专家”能否“成一家之言”,关键还在于他有无“别识心裁”。

当代多数史家都把“别识心裁”理解为独到的、

不同流俗的见解。但也有一些史家持不同意见,比如倪德卫认为章学诚的“‘别识心裁’似乎是天才的明显标志”<sup>⑱</sup>。余英时认为“别识心裁”是史家“一下子能够把握住大处的本领”,并“显然带有浓厚的直觉意味”<sup>⑲</sup>。山口久和认为“实斋所说的‘别识心裁’可以理解为是和‘性灵’相同的东西……在客观知识活动的纵深之处,潜藏着隐含于考证学知识表面下的微妙之知,这种知虽然自己可以理解,但是要想用语言向别人传达的话,就很难了”<sup>⑳</sup>。在他们看来,“别识心裁”是一种神妙的直接感悟和无法言传的主观判断力,源于史家自身的天性和禀赋。章益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申论,从历史认识的“默会维度”指出“别识心裁”有“指向‘文字之外的默会传统’的含义”<sup>㉑</sup>。这样的看法,丰富了人们对章学诚“别识心裁”的认识,为我们全面解读“别识心裁”提供了帮助。

章学诚讨论通史撰述,屡次使用“别识心裁”一词。细究其论述,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:一是体例上的“别识心裁”;二是史义上的“别识心裁”。

(一)体例上的“别识心裁”。章学诚的“别识心裁”尽管有天性、感悟的“意味”,但并非虚灵飘渺、不可捉摸的“神来之思”,而是有着具体的历史编纂学内容的“独断之思”。章学诚认为,“史无别识心裁,便如文案孔目”<sup>㉒</sup>,由此他在《释通》《申郑》《答客问》等篇章中申述了通史编纂运用“别识心裁”的重要性。在章学诚看来,通史编纂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前人已有相关著述,或通史或断代,如何超越前人?只能靠“别识心裁”!也就是“即彼陈编,就我创制”<sup>㉓</sup>。所谓“就我创制”,就是运以“别识心裁”,写出超越前人的通史。通史修纂如无“别识心裁”,“古人称述已厌其多,岂容更益简编,撑床叠架为哉”<sup>㉔</sup>!司马迁作《史记》,在体例上多有独创之处,所谓“创例发凡,卓见绝识”。“盖史迁创例,非不知纪传分篇,事多散著,特其书自成家,详略互见”<sup>㉕</sup>。他在列传中把屈原与贾谊合传、老子与韩非合传,自见别裁,义有独断,“即楚之屈原,将汉之贾生同传;周之太史,偕韩之公子同科。古人正有深意,相附而彰,义有独

断。末学肤受，岂得从而妄议耶”<sup>⑤</sup>？凡此种种，得到章学诚高度评价。章学诚赞扬郑樵作《通志》“承通史家风”“所振在鸿纲”，其《二十略》“以史翼经，本非断代为书，可以递续不穷者比”，属于“专门绝业，汉唐诸儒不可得闻者也”<sup>⑥</sup>。章学诚称赞袁枢《通鉴纪事本末》，说该书“因事命篇，不为常格”，“网罗隐括，无遗无滥”，“文省于纪传，事豁于编年，决断去取，体圆用神”<sup>⑦</sup>，无非是因为该书不拘成法，具有“别识心裁”。

体例上的“别识心裁”要求作史要灵活变通，反对“拘守成法”，重视史体创新。章学诚认识到，史事变化万端，史书就应该适应叙事的需要，不断变化体例。他在《书教下》中说：“夫史为记事之书，事万变而不齐，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，则必因事命篇，不为常例所拘，而后能起迄自如，无一言或遗而或溢也。”纪传体行世一千多年，史家相承，没有更易，关键就是“书为体例所拘”，没有“别识心裁”，不懂随时变更，“而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，不敢稍变；如治胥吏之簿书，繁不可删”。由此他提倡“通史撰述无定法”，“意之所在，必有别裁，或详人之所略，或弃人之所取，初无一成之法”<sup>⑧</sup>，“折衷六艺，成一家言，往往以意命篇，不为常例”<sup>⑨</sup>。唯其如此，才能编纂出“成一家之言”的通史。

(二)史义上的“别识心裁”。章学诚讨论通史编纂，常将“别识心裁”与“史义”联系在一起。他曾以人的身体来比喻史书所具有的事、文、义，所谓“事者其骨，文者其肤，义者其精神也”。于人而言，“义”犹如人的精神，精神垮了，一切就完了。于史书而言，“义”就是史书的灵魂，没有灵魂的史书只是史料的堆砌。所以“断之以义，而书始成家，书必成家，而后有典有法，可诵可识，乃能传世而行远”<sup>⑩</sup>。“义”既然被比喻为人的精神，就有了一种难以准确表述的飘忽之感，“其义难以一言尽也”。而“别识心裁”也蕴含“性灵”“直觉”等精神要素，故而“义”在某种程度上与“别识心裁”相通。章学诚在《申郑》中直接将《春秋》的“史义”与郑樵的“别识心裁”放在一起讨论，他说：“孔子作《春秋》，盖曰其事则齐桓、晋文，其

文则史，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乎尔……则史家著述之道，岂可不求义意之所归乎？自迁、固而后，史家既无别识心裁，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，惟郑樵稍有志乎求义，而缀学之徒器然起而争之。”<sup>⑪</sup>郑樵承袭《春秋》家学，运用“别识心裁”，在史事、史文之上求“义”。通过这样的论述，章学诚赋予了“别识心裁”以具体的思想内涵。

“别识心裁”蕴含经世致用之意。章学诚认为，“知史学之本于《春秋》，知《春秋》之将以经世……史学所以经世，固非空言著述也。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，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《春秋》，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……学者不知斯义，不足言史学也”<sup>⑫</sup>。他在《答客问上》中指出《春秋》“笔削大义”的终极指向是“纲纪天人，推明大道”。圣人通过《春秋》的“属辞比事”，表达对“天人”及“大道”的认识，彰显经世致用的思想。而这，也恰恰是“别识心裁”的形而上表达，是作史的“宗旨”，所谓“作史贵知其意，非同于掌故，仅求事文之末也。夫子曰：‘我欲托之空言，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’此史氏之宗旨也”<sup>⑬</sup>。“别识心裁”既有“托之空言”之形上思考，又有“见诸行事”之形下考量，而其关键是“明道”，即通过“笔削独断”以“推明大道”。章学诚讨论史学问题，一方面强调“明道”。所谓“史家之书，非徒纪事，亦以明道也。如使《儒林》《文苑》不能发明道要，但叙学人才士一二行事，已失古人命篇之义矣”<sup>⑭</sup>。作史不能只叙述人物事迹，还要有“发明道要”；另一方面又强调“独断必凭事实”<sup>⑮</sup>。所谓“典章事实，作者之所不敢忽，盖将即器而明道耳”<sup>⑯</sup>。也就是要根据史实阐发史义，“即器以明道”。章学诚指出，撰写通史，详近略远，是经世致用的具体表现，而尤以司马迁作《史记》为代表，“史部之书，详近略远，诸家类然……《太史公书》详于汉制……秦楚之际，下逮天汉，百余年间，人将一惟迁书是凭；迁于此而不详，后世何由考其事耶”<sup>⑰</sup>。“通史家学”注重记载近当代史事，现实指向非常明显，这是古代通史撰作的优良传统。

总之，章学诚的“别识心裁”有“天分”与“直觉意味”的一面，但更有其实际的内涵，那就是史体上的

不拘成法和史义上的经世致用,包含着对通史的形上思辩和形下安置。如果脱离了这些具体内涵,抽象的“别识心裁”就像国画中的留白脱离了国画的内容一样,必然变成毫无意义的妄想。

#### 四、余论

“通”和“家”是认识章学诚“通史家风”及其通史思想的两个核心概念,缺一不可。

章学诚重“通”,他讨论“通史”问题,总是从“家学”“家法”出发来认识“通”。他倡导“《春秋》家学”,并由“家学”而引申出“家法”和“家风”,其“通史家风”与“《春秋》家学”是贯通的。从“《春秋》家学”到“通史家风”,其意义转换的核心是“家学”。章学诚的“通”,宗旨明确,是有“家学”、有“家法”的“通”,这种“通”不是量上的扩充,不是“泛骛以求通”,而是“推微而知著,会偏而得全”<sup>90</sup>。所谓“通史家风”,“家学”之意旨在前,“通史”之意旨在后。章学诚由“家学”而引申出“专家之学”“专门家学”“专门之业”“专门绝业”等,并将“史义”“别识心裁”与“一家之言”贯通,意在说明“通史”的旨趣自有其一以贯之的内在精神传承。在章学诚笔下,“通史家风”既是通史的传统,更是承袭“《春秋》家学”,贯穿“史义”的撰作通史的方式。

章学诚重“家”,他讨论“家学”问题,总是从“通”的角度思考和推演。章学诚“辨章学术,考镜源流”,所论“《春秋》家学”,以“属辞比事”和“史义”贯穿始终,从司马迁、郑樵等通史撰述的宗旨考量“家学”的重要,即源达流,由流溯源,打通了经史间隔,疏通了由“《春秋》家学”到“通史家风”的关联和转换。在章学诚眼里,“专门家学”蕴含着通变意识,既有其主旨,又随着时代变迁不断注入新内容。章学诚以“通”之眼光看待“家学”,在“《春秋》笔削大义”的基础上阐发“别识心裁”的意蕴,引申出通史撰述中难以与外人道的“法外之意”,实际上就是以“通”之眼光考量“家学”演变。

要之,章学诚的“通史家风”,“通”主要来源于司马迁作《史记》的“通古今之变”,“家”主要来源于孔子作《春秋》的“《春秋》家学”。以“通”论“家”,“家”

因“通”而明源流;以“家”衡“通”,“通”因“家”而分类例,这是章学诚通史思想的最大特点。

#### 注释:

①如许凌云:《试论“通史家风”》,《历史研究》1983年第4期;吴海兰:《整体思维视域下的“通史家风”》,《天津社会科学》2018年第6期。

②瞿林东:《论“通史家风”旨在于“通”》,《史学月刊》2018年第7期。

③章学诚:《文史通义》内篇四,《横通》,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,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,第262页。

④刘家和:《论通史》,《史学史研究》2002年第4期。

⑤章学诚:《文史通义》内篇四,《释通》,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,第241页。

⑥章学诚:《文史通义》外篇一,《史考摘录》,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,第459页。

⑦章学诚:《文史通义》内篇四,《答客问上》,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,第252页。

⑧章学诚:《文史通义》内篇一,《书教中》,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,第28页。

⑨刘家和:《论通史》,《史学史研究》2002年第4期。

⑩郑樵:《通志二十略》,通志总序,中华书局1995年版。

⑪章学诚:《文史通义》内篇四,《释通》,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,第237页。

⑫章学诚:《校讎通义》卷1,《互著》,见王重民《校讎通义通解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,第21页。

⑬章学诚:《文史通义》内篇一,《书教下》,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,第36-39页。

⑭章益国:《道公学私:章学诚思想研究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,第197-202页。

⑮章学诚:《章氏遗书》卷29,《又与正甫论文》,见《章学诚遗书》,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,第337页。

⑯章学诚:《文史通义》内篇一,《礼教》,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,第70-71页。

⑰章学诚:《文史通义》外篇三,《答沈枫堦论学》,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,第713页。

⑱章学诚:《文史通义》内篇六,《杂说》,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,第352页。

⑲章学诚:《文史通义》内篇四,《释通》,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,第241页。

⑳章学诚:《文史通义》内篇四,《答客问上》,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,第253页。

⑳章学诚:《文史通义》外篇一,《论修史籍考要略》,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,第434页。

㉑章学诚:《文史通义》内篇四,《答客问上》,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,第253页。

㉒吴怀祺:《章学诚的易学与史学》,《史学史研究》1997年第1期。

㉓章学诚:《文史通义》内篇一,《书教下》,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,第37-38页。

㉔章学诚:《文史通义》外篇三,《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》,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,第671页。

㉕章学诚:《章氏遗书》外编卷3,《丙辰札记》,见《章学诚遗书》,第391页。

㉖章学诚:《文史通义》外篇三,《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》,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,第671-672页。

㉗倪德卫:《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(1738-1801)》,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,第145页。

㉘章学诚:《校讎通义》卷1,《原道》,见王重民《校讎通义通解》,第2-3页。

㉙章学诚:《文史通义》内篇一,《经解上》,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,第76页。

㉚章学诚:《文史通义》内篇一,《易教下》,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,第17页。

㉛章学诚:《文史通义》外篇一,《立言有本》,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,第358页。

㉜章学诚:《校讎通义》卷1,《宗刘》,见王重民《校讎通义通解》,第8页。

㉝章学诚:《文史通义》外篇一,《史考释例》,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,第439页。

㉞周启荣:《史学经世:试论章学诚〈文史通义〉独缺〈春秋教〉的问题》,《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》第18期,1990年6月。

㉟章学诚:《校讎通义》卷1,《互著》,见王重民《校讎通义通解》,第15页。

㊱章学诚:《文史通义》外篇三,《上朱大司马论文》,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,第767页。

㊲章学诚:《文史通义》内篇一,《经解下》,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,第88页。

㊳章学诚:《文史通义》外篇一,《史考摘要》,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,第457页。

㊴章学诚:《文史通义》内篇四,《申郑》,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,第249-250页。

㊵章学诚:《文史通义》外篇一,《史考摘录》,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,第458页。

㊶章学诚:《文史通义》内篇三,《黠陋》,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,第181页。

㊷章学诚:《文史通义》内篇四,《申郑》,见仓修良《文史通

义新编新注》,第249页。

㊸章学诚:《文史通义》外篇四,《〈和州志·前志列传〉序例上》,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,第931页。

㊹章学诚:《文史通义》内篇四,《答客问上》,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,第252页。

㊺倪德卫:《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(1738-1801)》,第145页。

㊻刘知幾:《史通》内篇,《六家》,赵吕甫《史通新校注》,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,第45页。

㊼章学诚:《章氏遗书》外编卷3,《丙辰札记》,见《章学诚遗书》,第389页。

㊽章学诚:《文史通义》外篇一,《论修史籍考要略》,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,第432页。

㊾章学诚:《文史通义》外篇一,《史考摘录》,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,第458页。

㊿章学诚:《文史通义》外篇一,《史考摘录》,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,第453-457页。

①章学诚:《文史通义》内篇一,《书教下》,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,第36-37页。

②章学诚:《文史通义》内篇四,《说林》,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,第222页。

③章学诚:《文史通义》外篇一,《史考摘录》,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,第458页。

④章学诚:《文史通义》内篇四,《释通》,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,第240页。

⑤章学诚:《文史通义》内篇四,《申郑》,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,第249页。

⑥章学诚:《文史通义》内篇四,《释通》,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,第240页。

⑦章学诚:《文史通义》外篇一,《史考摘录》,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,第459-460页。

⑧章学诚:《章氏遗书》外编卷3,《丙辰札记》,见《章学诚遗书》,第391页。

⑨章学诚:《文史通义》外篇一,《史考摘录》,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,第458页。

⑩章学诚:《文史通义》内篇四,《释通》,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,第237-238页。

⑪章学诚:《文史通义》外篇一,《史考摘录》,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,第459页。

⑫章学诚:《文史通义》外篇一,《史考摘录》,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,第459页。

⑬章学诚:《文史通义》内篇四,《释通》,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,第238-239页。

⑭章学诚:《文史通义》内篇四,《释通》,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,第238-240页。

⑮章学诚:《文史通义》内篇四,《释通》,见仓修良《文史通

义新编新注》，第238页。

①7章学诚：《文史通义》外篇五，《〈亳州志·人物表〉例议上》，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，第995页。

①8章学诚：《文史通义》内篇六，《师说》，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，第335页。

①9章学诚：《文史通义》外篇三，《家书三》，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，第819页。

②0章学诚：《文史通义》外篇五，《〈永清县志·阙访列传〉序例》，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，第983页。

②1余英时：《论戴震与章学诚》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，第75-76页。

②2章益国：《道公学私：章学诚思想研究》，第383页。

②3章学诚：《文史通义》内篇六，《文集》，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，第319页。

②4章学诚：《文史通义》内篇一，《礼教》，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，第72页。

②5章学诚：《文史通义》外篇四，《〈和州志·志隅〉自叙》，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，第887页。

②6章学诚：《文史通义》外篇四，《〈和州志·艺文书〉序例》，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，第914页。

②7章学诚：《文史通义》内篇四，《申郑》，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，第249页。

②8章学诚：《文史通义》内篇四，《答客问中》，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，第257页。

②9章学诚：《文史通义》内篇六，《杂说》，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，第355页。

③0章学诚：《文史通义》外篇六，《为张吉甫司马撰〈大名县志〉序》，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，第1041页。

③1章学诚：《文史通义》外篇一，《史考释例》，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，第443页。

③2章学诚：《文史通义》外篇三，《家书四》，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，第821页。

③3钱穆：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（上册）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，第448页。

③4钱穆：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（上册），第453页。

③5章学诚：《文史通义》外篇一，《史篇别录例议》，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，第427页。

③6章学诚：《文史通义》外篇一，《史考摘录》，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，第459页。

③7章学诚：《章氏遗书》卷18，《邵与桐别传》，见《章学诚遗书》，第177页。

③8倪德卫：《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（1738-1801）》，第146页。

③9余英时：《论戴震与章学诚》，第76页。

④0山口久和：《章学诚的知识论——以考证学批判为中心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226页。

④1章益国：《道公学私：章学诚思想研究》，第57页。

④2章学诚：《文史通义》外篇五，《〈永清县志·阙访列传〉序例》，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，第983页。

④3章学诚：《文史通义》内篇四，《释通》，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，第238页。

④4章学诚：《文史通义》外篇三，《〈与史余村〉》，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，第686页。

④5章学诚：《文史通义》外篇一，《史篇别录例议》，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，第427页。

④6章学诚：《文史通义》内篇四，《释通》，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，第239页。

④7章学诚：《文史通义》内篇四，《申郑》，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，第249页。

④8章学诚：《文史通义》内篇一，《书教下》，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，第38页。

④9章学诚：《文史通义》外篇五，《〈亳州志·掌故〉例议下》，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，第1005-1006页。

⑤0章学诚：《文史通义》外篇一，《史篇别录例议》，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，第429页。

⑤1章学诚：《文史通义》外篇四，《方志立三书议》，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，第829页。

⑤2章学诚：《文史通义》内篇四，《申郑》，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，第250页。

⑤3章学诚：《文史通义》内篇二，《浙东学术》，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，第121-122页。

⑤4章学诚：《文史通义》内篇四，《言公上》，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，第202页。

⑤5章学诚：《文史通义》外篇五，《〈永清县志·前志列传〉序例》，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，第985页。

⑤6章学诚：《文史通义》外篇一，《史考释例》，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，第440页。

⑤7章学诚：《文史通义》内篇四，《答客问上》，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，第253页。

⑤8章学诚：《文史通义》外篇四，《记与戴东原论修志》，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，第885页。

⑤9章学诚：《文史通义》外篇一，《通说为邱君题南乐官舍》，见仓修良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》，第495页。